



二十世紀初，整個歐洲的知識界都受到戰爭激情的渲染，他們把戰爭視為文化鬥爭和人類救贖的工具，是摧毀舊制度、建立新秩序的唯一出路。但戰爭的殘酷卻終結了歐洲藝術家對技術及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信仰。

戰爭作為文化鬥爭的工具

——一戰與藝術

黃鳳祝、劉麗榮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藝術，是西方藝術史在思想上最為活躍的一個階段。挑戰權威、追求個性的嘗試激勵着年輕的藝術家，積極地參與時代精神的建構。那個時代的藝術創作，完全掌握在藝術家的手中。藝術的商品特徵尚未被資本無限地放大，藝術家不必為了「藝術終結」的命題而煩惱，「主義」和「運動」也沒有因為濫用而淪落得面目可憎。

超越了傳統的社會功能和審美目的，這一時期的藝術發展充滿了無限的自由和可能性。各種藝術流派層出不窮，每一種運動都有自己的宣言，渴望破舊立新，開創年輕、嶄新、充實的生活態度。在西方藝術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一個時代，藝術家們如此強調藝術的社會使命，希望用藝術改造社會，最終卻被泥沙俱下的社會變革裹挾了命運。

歐洲藝術界在一戰付出的代價

二〇一四年是一戰爆發一百周年。在那場席卷歐洲的戰爭中，有七千萬人參戰，一千七百萬人死亡於戰火。歐洲的藝術家也被捲入了戰爭，或是被動地應徵入伍；或是出於責任感；還有許多人滿懷激情地投入戰鬥，他

們頌揚戰爭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手段，夢想着一個嶄新的歐洲，經過戰爭的洗禮，世界將變得更美好。

藝術家馬克（August Macke）、馬爾克（Franz Marc）、波希尼（Ulmer + Boccioni）、雷蒙·杜尚和評論家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英年早逝，是歐洲藝術界在一戰遭遇的重大損失。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慕尼黑的藍色騎士畫派都與政治無關。在藝術創作理念方面，他們注重研究光線與色彩的關係，嘗試對物體進行不斷地抽象。藍色騎士的成員構成也超越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康定斯基、雅弗丁斯基（Alexej von Jawlensky）、威瑞夫金（Marianne von Werefkin）是俄國人，保羅·克利、馬爾克、馬克和蒙特（Gabriele Münter）是德國人。

馬克使用憂鬱而明亮的色彩，描繪風景、肖像和街景。一九一四年春，馬克和克利一起到突尼斯旅行。在北非清澈的光線中，兩位畫家分別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色彩運用方式。八月戰爭爆發，馬克自願報名參軍，七個星期之後，在西線陣亡，時年二十七歲。

一戰前夕，畫家馬爾克住在慕尼黑郊外，與康定斯基時有走動，共同編輯

出版《藍色騎士年鑑》。馬爾克勤於筆耕，他在書信往來中，與馬克討論色彩，與康定斯基討論抽象，在藝術雜誌上與貝克曼（Max Beckmann）進行激烈的論戰。戰爭爆發後，和馬克一樣，馬爾克自願投身戰事。在致康定斯基的戰地書信中，馬爾克談到大規模死亡的淨化作用，選擇投身戰場，是為了藝術與社會的革新。這種對於戰爭的熱情，顯然受到意大利未來主義者的影響。戰爭過半，馬爾克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希望能夠提前退伍。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連日來，我所看到的是人類所能想像的最深的恐懼，別無其他。」兩天之後，馬爾克在西線陣亡。不久，未來主義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意大利藝術家波丘尼在維羅納前線的一次騎馬事故中死去。

除了馬克和馬爾克，同時代的大部分德國前衛藝術家都參與了戰爭：克利、恩斯特（Max Ernst）、格羅茲（George Grosz）先後應徵入伍；貝克曼自願參戰，在前線醫院見證了毒氣戰的恐怖；戰爭經驗改變了迪克斯（Otto Dix）的畫風，使他的後期作品更具有表現力；基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因罹患神經衰弱而被遣散，在精神疾病

的困擾中繼續創作，二戰前夕，他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抽象藝術家變成現實主義者

歐洲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也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戰爭，戰前的抽象藝術家成為戰時的現實主義者。俄國至上主義畫家馬列維奇創作政治漫畫，諷刺德國士兵；奧地利畫家埃貢·席勒為俄羅斯戰俘畫像，醜化敵人；法國畫家安德烈·馬拉用立體主義的破碎色塊裝飾戰爭機器，發明了現代迷彩。第一台立體主義大炮在巴黎展出時，畢加索激動地向眾人宣布：這是我們的創造！他的親密合作者法國畫家布拉克應徵入伍，因頭部重傷接受了開顱手術。波意混血的藝術評論家阿波利奈爾為了獲得奔赴前線的資格，不惜改名換姓，加入法國籍，他在西線戰場被彈片擊中，頭部重傷。馬塞爾·杜尚的哥哥藝術家雷蒙·杜尚在前線駐紮時感染傷寒，他和阿波利奈爾都沒能堅持到戰爭結束。

二十世紀初，歐洲的社會發展處於一個轉折的時代，新興力量與保守勢力的較量日趨尖銳。不僅是藝術界，整個歐洲的知識界都受到戰爭激情的渲染，他們把戰爭視為文化鬥爭和人類救贖的

工具，是摧毀舊制度、建立新秩序的唯一出路。戰爭爆發後，包括胡塞爾、普朗克在內的三千名德國高校教師簽署聯合聲明支持戰爭，社會學家韋伯和哲學家海德格爾也先後投身戰爭。女藝術家珂勒惠支一度為戰爭感到振奮，後來逐漸認識到戰爭的非正義性。她的小兒子在西線戰場陣亡。戰後，她和許多歐洲藝術家轉向左翼政治。

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裂變，歐洲大部分國家實現了從君主立憲到共和政體的轉變，但是戰爭的殘酷也終結了歐洲藝術家對於技術進步和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信仰。面對戰爭，有人選擇了逃離。在瑞士流亡的歐洲藝術家，用達達的無意義回應戰爭的殘酷。戰爭使許多藝術家轉向純粹繪畫，在軍隊精神病院，喬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創作了《偉大的形而上學者》。馬塞爾·杜尚去往紐約，靠教授法語課維持生計，創作了包括《泉》在內的第一批「現成品」，用一種極端的方式質疑藝術的本質，面向遙遠的未來，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

（黃鳳祝是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劉麗榮是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